

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（十六）

李 致 忠

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 南唐徐锴撰 南宋中期浙江地区刻本 存十二卷（一、三十至四十卷、卷一配明抄本）每半叶七行，行十四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上未镌大小字数，版心下镌刊工姓名，计有顾昌、顾祐、陈礼、许成之等人。

徐锴字楚金，扬州广陵（今江苏扬州市）人。徐铉弟。生于五代梁末帝贞明六年（920），卒于北宋太祖开宝七年（974），享年五十五岁。锴幼年丧父，四岁而孤。时长他四岁的哥哥徐铉年已八岁，正当进学之年，故母亲殷殷教铉，而无暇顾及徐锴。然锴弱而聪敏，能自知其书。长而能文，与兄齐名，而实出其右，故有“大徐”、“小徐”之称。李景见其兄弟文章，叹曰“二陆不能及也”。举南唐进士，擢为秘书省正字，累迁屯田郎中，知制诰，迁右内史舍人，集贤殿学士。后因兄铉奉使入宋，焦虑而疾。又遇宋兵南下围困金陵，锴忧惧交瘁，卒于城中，时年五十有五。

徐锴精于小学，潜心许慎《说文》数十年。著有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、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五卷。从不同的角度对许氏《说文》加以阐释，故钱曾说他是许氏的功臣。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，为《通释》三十卷、《部叙》二卷、《通论》三卷、《祛妄》、《类聚》、《错综》、《疑义》、《系述》各一

卷。许氏《说文解字》本为十五卷，将每卷析为上下，故《通释》有三十卷之谓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称：“总名之《系传》者，盖尊叔重之书为经，而自比于左氏之内《春秋》作传也。”故于《通释》中凡有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，悉加“臣锴曰”或“臣锴案”等字样，以示与原文之别。《部叙》二卷，则拟《易·序卦传》之体例，以明《说文》五百四十部先后之次。至若《祛妄》，则专斥李阳冰之臆说；《类聚》则举字之相比为义者，如一、二、三、四之类；《错综》则旁推六书之旨，通之于人事，以尽其意；《疑义》则举《说文》偏旁所有而实缺其字，及篆体笔画相承而字实小异者；《系述》则犹《史证》之自叙，总言深旨。此书何时撰成，虽史未明书，但亦可以大体推知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谓：“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四十卷，简端题云‘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臣徐锴传释’。盖楚金仕江左，是书曾进览，故结衔如此。”可见此书之成，当在徐锴仕南唐的过程中。考南唐为北宋所灭，在北宋太祖开宝八年（975）。共历三主，享国凡三十九年。由此前推三十九年，则南唐立国当在后晋天福二年（937），即李昇昇元元年。徐锴出生时，南唐尚未立国。越十七年，南唐始定国号。北宋开宝七年（974），徐锴已病死金陵。故其所撰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当在937—974之间。

《宋史·文苑传·徐铉传》谓：“锴又集《通释》四十篇，考先贤之微言，畅许氏之玄旨，正阳冰之新义，折流俗之异端，文字之学善矣尽矣。今此书止欲便于检讨，无恤其他，故聊存古训，以为别议。……铉亲为之篆，镂板以行于世。”这就是说，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是由他哥哥徐铉亲为篆写而上板开雕行世的。考徐铉受命校定许氏《说文解字》，是在北宋太宗雍熙三年（986）。而徐氏领衔校定的《说文解字》中，已有多处引证锴说，可见早在雍熙三年以前，徐锴的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就已雕板。然锴未及降宋而卒，其兄徐铉归宋为官，食邑受封，位高名显，

公卿皆与之游，士大夫从其学者亦众。故自其所校定《说文解字》行世之后，锴书日晦。南宋孝宗乾道时，李焘因徐锴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而作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》，已叹谓“《韵谱》当与《系传》并行，今《韵谱》或刻诸学官，而《系传》迄莫光显。余蒐访岁久，仅得其七八，缺卷误字无所是心，每用太息”。

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一）表明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在宋初虽已有刻本，但至北宋末南宋初已无完帙可寻。致使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竟只字未提此书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，卷末有苏颂题识及后人抄录尤袤跋文。苏颂字子容，福建泉州人。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（1020），卒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生当北宋中晚期。他曾在熙宁二年（1069）见过监察王圣美传本，乃刘允恭等篆写的，故写题识于其上。谓：“司农南齐再看旧阙二十五、三十共两卷，俟别求补写。”表明此书在宋神宗时即已残缺。并借宋郑公之口，谓《系传》该洽无比。尤袤，字延之，号遂初居士，江苏无锡人，南宋绍兴间进士。生于北宋靖康二年（1127），卒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（1194）。生当南宋初期。他于乾道九年（1173）见到了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并写下了如下的跋文：“余暇日整比三馆乱书，得南唐徐楚金《说文系传》，爱其博洽有根据，而一半断烂不可读。会江西漕刘文潜以书来，言李仁甫托访此书，乃从叶石林借得之。方传录未竟而余有补外之命，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。此本得于苏魏公家，而讹舛尚多，当是未经校理也。乾道癸巳十月廿四日尤袤题。”李仁甫即李焘，仁甫是他的字，号巽岩，四川眉州人，举绍兴进士。“仁甫托访此书”，与李焘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》自序中所谓：“《韵谱》当与《系传》并行，今《韵谱》或刻于学官，而《系传》迄莫光显。余蒐访岁久，仅得其七八”之语心合，信尤袤之言为不诬。尤袤于三馆乱书中得窥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但一半断烂不可读。故当刘文潜

从江西惠书，说李焘托访此书时，尤氏却不得不从叶梦得家借本传抄。而叶氏藏本又得于苏魏公家，实则还是苏颂题识的那个传本。可幸的是，这次由于李焘托访，而由尤袤父子抄补成完帙。此为南宋又有此书完整刻本行世的历史缘由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虽只存十二卷，但当初刻印时却是完帙。后世流传中又行残缺，与南宋之前此书之残，性质不同，原因也不同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之宋本，卷一为前人以明抄本配补，无足描述。卷三十至四十系宋时原刻，雅有可言。卷三十首行顶格镌：“说文解字通释第三十”；二行低四格镌：“系传三十”；三行低二格镌：“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臣徐锴传释”。皮纸印造，行格疏朗，字体隽秀，刀法剔透，颇具浙刻风韵。此书因系残帙，无确凿证据可征，故历来只以“宋刻本”言之，提不出什么更具体的鉴定意见。现据书中之讳字与刻工等，对其版本试作考辨如次。

首先，此书避讳极不严谨，很多南宋初中期刻的书，于殷、敬、胤、树、讓、恒等北宋诸帝名讳，均行回避，多以缺笔以示之。此书卷三十之“以为太岳胤在颍川”；卷三十一“曰者敬敕持之也”；卷三十二“苟，敬也。敬近于事鬼”；卷三十三“揖讓升降”等句中的胤、敬、讓等字均不缺笔，表明其未行避讳。然卷三十四之“孟子曰象恒以杀舜为事，舜恒欲见之”中的恒字却缺去末笔，为字不成，似示回避北宋真宗赵恒名讳。同卷“慎之言身也，恒存于身也”句中的恒也缺末笔，似乎更进一步表示其回避真宗名讳。卷四十“大火以弘”句中之弘字也缺末笔；卷三十三“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，此殷道也”句中的殷字也缺末笔，表明弘殷二字均行回避。按弘殷是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名字。父因子贵，宋代讳法，凡遇弘、殷二字是该缺笔回避的。然前正举出，宋太祖赵匡胤的胤字却不行回避。未做皇帝的父名

回避，做皇帝的御名反而不避。这种现象除了说明此书避讳极不严谨外，无法做出别的解释。

同样，卷三十“慎博问通人，考之于逵”，“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”，“慎又学《考经》”；卷三十一“是而有行必慎”，“慎者心安”；卷三十三“君慎其口”等句中的慎字均不缺笔，表明南宋孝宗赵昚的名讳未行回避。然卷三十三“立身行道，当慎其积”；卷三十四“慎者谦也”，“慎之言身也”，“心直为慎”，“古文少火为慎”，“故当慎之也”，“非文辞不为功，慎辞也”；卷三十六“许慎岂如此之疏乎”，“许慎言其所由”，“许慎之后”，“无踰于慎也”，“许慎所作”；卷三十八“喋喋之辞，君子慎之”；卷三十九“许慎所解”；卷四十“爰及许慎，维纲振绳，勒成一家”等句中的所有慎字均缺末笔，以示避讳。表明南宋孝宗的名讳，又是回避的。孝宗之后是光宗，名赵惇，按宋代讳法，与惇有关的字也应回避。可本书卷三十四“此敦睦之意也”，“敦睦九族”中的两个敦字，均不缺笔，表明光宗名讳尚未及回避。光宗之后是宁宗，名赵扩。依宋代讳法，与扩有关的字也要回避。可此书卷三十一“享，音郭。京为高丘，郭外也”中的两个郭字也不缺笔，表明南宋宁宗的名讳更未及回避。我们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加以分析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第一，此本避讳极不严谨。这可能与两种情况有关，一是坊间刻本不大受讳法约束，想起来就避，想不起来就不避，随意性比较大。表现在书上，就是避讳不严谨。二是南宋初年皇帝曾经准过奏请，即讳不及经，以示皇帝尊经而轻讳。但实践上并未形成制度，致使南宋所刻经书避讳现象混乱。第二，此书避讳虽然极不严谨，但于南宋孝宗的名讳，即慎字回避最力。而于其前高宗名讳，其后光宗、宁宗名讳，又均有回避讳。说明此书之刻当在孝宗之世。

前边曾引述李焘为编纂《论文解字五音韵谱》，曾于孝宗时

数岁寻求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而不可得其全帙。于是委托刘文潜代为访查。孝宗乾道九年（1173），尤袤得刘文潜惠书，得知李焘托为采访，始从叶梦得家藏本借抄，补为完帙。徐锴《系传》既该洽无比，又世所罕传，因此在南宋孝宗时将尤氏抄录的完帙展转予以雕板行世，似也是情理中事。这样，历史史实与此书的避讳现象就吻合了，故此书很有可能就是刊板于南宋孝宗之世。

此本刻工不多，在仅存的卷帙上，反复出现的仅有顾昌、顾祐、陈礼、许成之等人。考许成之，乃南宋中期杭州地区刻工，他曾在庆元六年（1200）参与绍兴府知府沈作宾主持刻印的《春秋左氏传正义》的镌板工作。还于嘉泰间（1201—1204）参与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印《孟子注疏解经》的镌板工作。顾祐也是南宋中期杭州地区的刻工。他总和许成之一起，参与了上述两书的开板工作。绍兴古称越州，南宋时绍兴府的治所、两浙东路茶盐司官署，都设在这里。从绍兴到绍熙年间，两浙东路茶盐司共刻了五经，都是单经、注、疏合刻本。所用刻工都是从杭州请来的。原因是杭州多良工，又与绍兴一水之隔，往来方便。绍熙之后，绍兴府继续两浙东路茶盐司的未竟事业，又雕印了《春秋左氏传正义》的单经、注、疏合刻本，同样也从杭州招聘刻工，其中就有许成之、顾祐等人。即版本学史上的越州本六经，都是由杭州地区的刻工操刀的。嘉泰间，这批刻工又为两浙东路茶盐司镌刻了《孟子注疏解经》。这样一些刻工又出现在《说文解字系传》上，说明《说文解字系传》的开板时间，当也就在这段时间之内。前边所述就本书讳字及重出完帙，都证明其槧板当在孝宗一朝。再印证上述刻工，亦都是南宋中期杭州地区的良工。南宋享国凡152年，中期亦起自孝宗淳熙间。综合上述种种条件，此书之刻，似可定为“南宋中期浙江地区刻本”。

此本铃有：“吴郡赵颐光家经籍”、“沈氏雪侯”、“沈伯

守印”、“顾千里经眼”、“汪士钟藏”、“子雕金石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记。表明此本在明清两代递经名家收藏，可谓流传有绪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七，谓此本“卷中慎字减笔，是孝宗以后刻本也。旧为赵凡夫藏本，其叙目一卷、题跋二叶，赵氏抄补。”这里提到的赵凡夫，指的就是赵宦光。赵宦光，又作赵颐光，字凡夫，明代吴郡人。读书稽古，精于篆法。著有《说文长笺》、《六书长笺》等。此本经他收藏，可谓学问家收藏学问书。至清代，著名校勘学家顾千里曾据以校勘他本，所钤“顾千里经眼”印记，证明了这一点。顾千里乃嘉道间贫士，其经眼此书实在挚友黄丕烈家。黄氏藏书散出后多归汪士钟，故此本亦钤有“汪士钟藏”印记。后展转归铁琴铜剑楼，最后入北京图书馆。

《锺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十三卷 汉扬雄撰 晋郭璞解 宋庆元六年（1200）寻阳郡斋刻本 王圜运、缪荃孙、沈曾植、袁克文、邓邦述、章钰跋 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七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

扬雄字子云，蜀郡成都（今属四川）人。生于西汉宣帝刘询甘露元年（前53），卒于王莽新政天凤五年（公元18），享年六十六岁。西汉成帝时曾为给事黄门郎。王莽新政时曾校书天禄阁，官至大夫。尝作《剧秦美新》以谀莽。为人口吃，不能剧谈，以文章名世。早年雅好词赋，并模仿司马相如赋作《长扬》、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诸赋。后又主张一切言论都应以《五经》为准则，视词赋为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。并转而研究哲学，仿《易经》而作《太玄》，仿《论语》且作《法言》。提出了有生者必有死，有始者必有终，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。批判老庄的绝仁弃义，重视儒家学说。著有《方言》，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，为后世研究古代方言留下了重要文献。又续《苍颉篇》编成《训纂篇》。

考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，可谓备列扬雄所著之书，而未及《方言》一字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小学类著录扬雄《训纂》一篇；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，注云《太玄》十九、《法言》十三、《乐》四、《箴》二；杂赋类著录扬雄赋十二篇，亦未及《方言》一字。东汉一百十九年中，亦无称雄作《方言》者。至东汉末年，应劭作《风俗通义》，其序谓：“周、秦常以岁八月遣轺轩之使，求异代方言，还奏籍之，藏于密室。及嬴氏亡，遗脱漏弃，未见之者。蜀人严君平有千馀言，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。扬雄好之，天下孝廉、卫卒交会，周章质问，以次续注，二十七年，尔乃治正，凡九千字。其所发明，犹未若《尔雅》之闳丽也，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。”应劭注《汉书》，亦曾引用扬雄《方言》。可见，谓扬雄作《方言》，实自应劭始。魏晋以后，诸儒转相沿述，皆无异词。如晋葛洪在《西京杂记》卷三中就说：“扬飞云好事，常怀铅提槧，从诸计吏，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，以为裨补轺轩所载，亦洪意也”。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扬雄撰著《方言》的说法。然“后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多引雄说，而其文皆不见于《方言》。又慎所注《字义》，与今《方言》相同者不一而足，且皆不标扬雄《方言》字。知当慎之时，此书尚不名《方言》，亦尚不以《方言》为雄作。故马融、郑玄诸儒未尝称述。至东汉之末，应劭始有是说。魏孙炎注《尔雅》莫貉螳螂蚱字，晋杜预注《左传》授师子焉句，始递相征引。沿及东晋，郭璞遂注其书。后儒称扬雄《方言》，盖由于是。”（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。）可见谓《方言》为扬雄所作，实是后世的谈法。故四库馆臣谓“反复推求，其真伪皆无显据，姑从旧本，仍题雄名，亦疑以传疑之义也。”（同上）所以自东晋郭璞注《方言》以来，就都将《方言》著于扬雄名下了。

《方言》之宋刻，传世极罕。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庆元刻本，当是存世《方言》中最早的刻本。且自明朝中叶以来，递经名家

收藏，品题连篇，名重垂三四百年。

此本每半叶八行，每行十七字，注文小字双行，行字同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版心上记大小字数，下记刊工姓名。前录郭璞旧序。又有庆元庚申会稽李孟传序。又有东阳朱质序。李孟传序谓：“西汉氏古书之全者，如《盐铁论》、扬子云《方言》，其存盖无几。《盐铁论》，前辈每恨其文章不称汉氏，唯《方言》之书最奇古。……今所在镂板辄误作‘病不禁’。此书世有所传而无与是正，知好之者少也。……今《方言》自闽本外不多见，每惜其未广。予来官寻阳，有以大字本见示者，因刊置郡斋，而附以所闻一二，盖惜前辈之言久或不传也。庆元庚申仲春甲子会稽李孟传书。”庆元庚申，即庆元六年（1200）。这段序文明白无误地说明，李孟传在官寻阳的时候，因某大字本而将《方言》重刊于寻阳郡斋。

考李孟传字文授，会稽上虞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资政殿学士李光的幼子。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（1219），享年八十三岁。《宋史·李孟传》说他父亲李光谪迁领海时，孟传方才六岁。“奉母居乡，刻志于学，贺允中、徐度皆奇之。……韩侂胄与孟传故，尝致侂胄意。孟传谢曰：‘行年六十，去意已决’。侂胄愠而退请外知江州，狱讼止息。”已知李孟传生于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由此后推六十年，当是庆元二年（1196）。这就是说，李孟传在行年六十岁以后才知江州。

考江州，为晋初分荆州及扬州而置，为今湖北旧武昌府及江西省地，治所在豫章，即今南昌县治。后移治所于武昌，即今湖北武昌县治。后又移治寻阳，即今江西九江县。可见知江州与官寻阳，完全是一回事。《地理通释》引述朱熹的话说，汉九江郡本在江北，后以江北之寻阳併柴桑而立郡，又自江北徙治江南，故江南得有寻阳之名。亦可证明李孟传于庆元间知江州与序中自谓

官寻阳，的确是一码事。因信李孟传庆元六年《方言》序中所说“予来官寻阳，有以大字本见示者，因刊置郡斋”的话为不诬。此为此本《方言》于庆元六年由李孟传主刻于寻阳郡斋之确证。

又此本刻工多已模糊不清，可辨者仅毛俊、余萃、余俊、章智四人员蔡、度、寅、谅各一字。考毛俊于庆元六年参与过绍兴府八行注疏本《春秋左传正义》的镌板工作。嘉泰间又参与过两浙庾司《礼记正义》和《孟子注疏解经》的雕板工作。可证他是位浙东地区的刻工。而寻阳郡斋刊本《方言》，亦在庆元六年付梓。以活动在浙东地区的毛俊而论，他在同一年里既在浙江绍兴开雕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又跑到江西寻阳参与刊刻《方言》，无论是从水路或陆路上看，都没有这么方便，或者说都没有这种可能。因此，此本《方言》上的毛俊，恐怕是另一个毛俊，或者说是江西地面的毛俊。而余俊则于淳熙四年（1177）为江西抚州公使库刊刻过《礼记注》。又参与刻过《新唐书》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刊工，他以江西籍的身份，可以进一步证明《方言》刊于寻阳郡斋的可信程度。

考此本《方言》避讳，朗、树、桓、构、慎、惇、敦、廓等字，均缺笔为讳，为字不成。如郭璞序中“历载构缀，乃就斯文”，构字缺笔成“构”，表明南宋首帝高宗赵构的御名仍在避讳，所以其刻必在高宗或高宗之后。卷一“惟虑愿念，靖慎思也”；“靖，秦晋或曰慎”；“凡思之貌亦曰慎”当中的慎字均缺末笔，说明南宋二帝孝宗赵昚的嫌名也已经回避。卷一“硕沈巨濯讎敦夏于大也”中的敦字缺末笔；卷七“展惇信也，东齐海岱之间曰展，燕曰惇。注惇亦诚信兒”当中的惇字亦均缺末笔，说明南宋三帝光宗赵惇的嫌名也已回避。卷十三“廁，音廓”廓字缺末笔，说明南宋四帝宁宗赵扩的嫌名也已经回避。而宁宗临御所用的第一个年号便是庆元，此亦为庆元刻本之佐证。综合上述李孟传序文、

书中刻工及讳字现象，充分证明此书版本当著录为“南宋庆元六年（1200）李孟传寻阳郡斋刻本”。

此本钤有“横经阁收藏图籍印”、“华亭朱氏”、“顾仁效收藏图书”、“仁效”、“顾元庆鉴赏印”、“季振宜藏书”、“扬州季氏”、“沧苇”、“振宜之印”，李序栏外有墨书“野竹斋装”四字，表明此书自明朝以来迭经名字收藏，因而就愈显珍贵。横经阁是明代华亭朱大韶的藏书处。朱大韶字象玄，松江华亭人，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进士。性喜藏书，尤爱宋时刊本。相传尝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槧袁宏《后汉纪》，系陆放翁、刘须溪、谢叠山所手评，且饰以古锦玉签，遂以一美婢易之，足见其视宋刊重美女。此本经他收藏，其珍贵自是不言而喻。野竹斋主人沈与文，字辨之，亦是嘉靖时吴县人。喜好藏书。其抄书稿纸栏右角常有“吴县野竹家沈辨之制。”顾仁效，长洲人。明武宗正德时结庐阳山之下。好读书吟咏，兼工绘事，喜藏书。其藏书处曰水东馆。此书有他的藏印，说明在朱大韶之前，已为顾氏水东馆插架之物。顾元庆，字大有，亦是长洲人。所居曰顾家青山，即阳山大石下。藏书万卷，藏书楼曰夷白堂，盖与仁效有关，或为族人。此书有元庆藏书印，或为仁效递传之。明末清初，此本又归钱曾述古堂。钱氏《读书敏求记》尝谓旧藏宋刻《方言》，牧翁为余题跋，后归之季沧苇云云。今此书确有季沧苇印记，信钱曾所言之不诬。季沧苇名振宜，字诒兮，号沧苇，扬州泰兴民。清顺治四年（1647）进士，授兰谿令，历刑、户两曹，擢御史。家本豪富，江南故家之书多归之，精本最富。《述古堂书目》序谓：“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，折阅售之泰兴季氏。”故前人论说，谓季氏书半出钱氏。亦证明此书由顾仁效、顾元庆、朱大韶，经钱曾而归季振宜的递藏关系，是很清楚的。然此书自季沧苇家散出后，沉晦殆二百年，乾嘉诸老皆未得见。至清末又归宗室盛昱意园所藏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盛氏意园藏书再度散

出，傅增湘从正文斋购藏此书，从此又归傅氏藏园，双鉴楼插架之物。后傅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，此书亦随之而入归北图。傅氏得此本后，曾写有长跋，述其得书原委，并与吴琯《古今逸史》本对勘，文字上此胜而彼劣者如下。卷二“及其所爱曰伟”，“伟”不误“讳”；“其肥臧”，“臧”不误“臧”；“餽诌”，“诌”不误“诌”。卷三“诈通语也”，“语”不误“诈”。卷五注“楚转声也”，不误“声转耳”。卷九“其柄谓之矜”，“矜”不误“铃”。至其脱文，则更显出此本之胜。傅氏是四川人，他以重价购藏此书，亦以扬雄为蜀中先贤。乡邦遗著，格外青睐。所以得此书后，屡请名家题跋。这些跋文虽未必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但对此本流传是很好的记录，对此书也是很好的书评，故依书中所居次序逐录于后。

“《方言》十三卷，宋刻宋印本。后有庆元庚申跋两段。书中避讳至惇字，即宁宋时刊本。季沧苇、顾仁效、顾元庆、朱大韶递藏。仁效、元庆均长洲人，居阳山下。朱大韶，华亭人，横经阁即其藏书处。国初归沧苇，《季氏书目》云“扬子《方言》六卷四本，牧翁跋”即此书。钱跋疑在庆元跋之后，书禁严时撤去一叶，影写六字补之。书十三卷，《季氏书目》云六卷，误。壬子十月缪荃孙识。”

按：缪跋写于民国元年（1912）十月，距傅增湘得是书不过三月余。缪荃孙是清末民初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。然于此书版刻之推定，未免粗疏武断了。前已论证，此本非但有庆元六年李孟传刻书序，申明刊于庆元六年。而且书中讳字亦不止于光宗名讳“惇”，而是止于宗宗名讳“廓”字。盖缪氏粗翻此书，未经细读，匆忙应制，使论据与结论不相谐耳。

“意园得此书时，曾为余举宋刻胜景宋本数事，许之借校。从公鲜暇，愿未果也。人天永隔，复见此书，老泪滂沱，乃不胜如菴春露之痛。沅叔欲重刻传之，此固意园有志而未竟者也。壬子

十月姚埭老民植书。”

“壬子夏秋之交，意园书始出，沅叔同年得精槧名校本甚夥，而以《方言》为甲观绛云一跋，不所复读。而纸版古香腾溢，真足为惊人秘笈。意园宋元版不多而至精，其书之最烜赫者《礼记》四十册，宽整如新，吾与沅叔皆议价而莫能举。然吾仅得一《冯丛子》，虽号称嘉祐刻本，实不及此书远矣。信知沅叔真有书福者。甲寅立春群碧主人邓邦述记。”

“郁华阁藏宋槧之精整完好者，惟黄唐本《礼记正义》与此书为巨擘。自壬子散出，多人景贤手。此则为燕超主人所获，否则亦随《礼记》诸书入我篋矣。盖景氏得书后未几即统举宋本售诸文。中有黄善夫刊《苏诗》、汀州本《群经音辨》，亦盛氏书中之上驷。然舍《礼记》外，无可与此书抗者。虽同为宋本，当视其著作为次第之。此书直甲之甲者，岂可作甲观耶！丙辰八月棘人袁克文。”

“江安傅氏藏宋本甲观。夏正甲寅二月上丁长洲章钰记。”

“余旧藏扬子《方言》，正是此本，而纸墨尤精好。纸是南宋枢府诸公交承启割，翰墨灿然。于今思之，更有东京梦华之感。

（跋见《有学集》四十六卷。牧翁所藏想归天上，则此本由乙而推用矣。沅叔宝诸。艺风检记，若理遄写。）”

“余所藏宋本书，纸墨必精。此本盖南宋，非北宋也。方今旧本盖稀，小山所云推甲，盖有慨也。甲寅五月王闳运观。”

“此即钱遵王售于季沧苇宋本书之一。其后虽经顾、朱递藏而不见于著录。承兵燹之餘，鬼神呵护，乃为沅叔所有。将倩工重刻，惊人秘笈，行见流传千万本于天壤间，何幸如之。壬子仲冬宜都守敬记于上海，时年七十有四。”

“郁华阁藏书流传我邦者，余亦获数种，皆邦旧刻。如此宋本，乃归沅叔先生，物宜各归其本主，我不以为憾也。丁巳十二月九日内腾虎。”

“意园旧藏宋本不多而至精，孝先之言甚确。昌绶所收《甲申杂记》、《闻见近录》已赠艺风。《倚松老人诗》亦归寒云。皆宋刻宋印孤帙。此更为汉代蜀贤遗书，宜沅叔奉此镇库重宝也。丁巳闰二月仁和吴昌绶谨志。”

“此本与卢抱经所校李文授本殊不尽合，如卷九‘𩚑𩚑’，卢校本‘𩚑首’，此本仍作‘𩚑’。卷十二‘𩚑音映’，卢校李本音‘影’，此本仍作‘映’。‘盪歇’，卢校李本歇下作‘许竭’二字，此本作‘泄气’。又注中‘渴’作‘竭’，此仍作‘渴’。皆不可解。抱经所见殆影写或传校之本，必非真本也。沅叔见示此书，因书数语，冀他日重作校记，以匡卢氏之误耳。丁巳七月盛铎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